

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研究项目

HOUGONGYE
SHIDAI DE
TONGSHIJIAOYU SHIJIAN

后工业时代的 通识教育实践

——以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例

● 李曼丽 林小英 著

民族出版社

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研究项目

后工业时代的通识教育实践

——以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例

李曼丽 林小英 著
杜祖贻 汪永铨 指导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工业时代的通识教育实践/李曼丽, 林小英著 .
-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4

ISBN 7 - 105 - 05465 - 4

I . 后… II . ①李… ②林… III . 高等教育 - 教学研究
IV . G64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7994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若龙文化工作室微机照排 迪鑫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5.25 字数: 106 千字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 9.8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民教室电话: 64272078;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教育研究专著**

序

杜祖贻*

当前在海峡两岸暨香港的大学中都流行“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所谓“通识教育”，始源于公元1930年代的美国，倡导者为法学家 Robert M. Hutchins 氏。他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后，立即改组大学的课程。芝大的本科生，不论要进入哪一个专业，必须首先接受共同课程的训练，冀使每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兼具文化与科学的知识和思考与表达的能力。这个人人必修的基本课程，就是通识教育了。他与同校的 Mortimer Adler 教授合编《西方文化巨著丛书》(The Great Book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选注自古希腊以至近代西方的文理社哲经典佳作，作为必读的通识教材。其后美国多所著名大学都设计了类似的课程，用以

*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教育讲座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教育哲学教授兼研究科学家。

训练精英的大学生。六、七十年代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及密西根大学的住校书院课程都是其中的例子。私立的圣约翰学院更直接采用 Hutchins 所著《美国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in America*) 作为办学的蓝图。总之，这些不同名目的通识课程，都依照几个基本原则：

1. 通识教育的内容，是以经过时代考验的经典名著为基本；文、理、艺术兼重。
2. 重视学生的语文、数学及思考训练；闲杂科目一概摒弃。
3. 课程由资深教授悉心指导；学习必须认真，务求融会贯通。

我在密西根大学任教多年，指导过不少来自不同大学的研究生，其特别优秀的，多曾受过精萃的通识教育训练。一般而言，受过严格通识教育的学子，思路明确，谈吐清楚，能分轻重，知所选择，并且善于利用时间。还有，他们具有较高的理想，行为大方，态度诚挚。这些出色的表现，至少部分归功于上述精萃型的通识教育。

然而，原来版本的西方通识教育，一旦被移植到东方的中国人社会来却变了质。不仅变质，而且变种。本来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是“求学者人人必须学习得通透的基本学问”，可是，来了中土以后的所谓通识教育，竟变为“五花八门的科目，通通都算是知识的杂学”。这个变化，的确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奇观。

这奇观我们可以追溯到五十年代，留学生和西方传教士自英美引进西式教育到香港和台湾，同时也把通识教育的观念带来。表面的宗旨是提倡进步的人文主义，以对抗已趋狭隘的专业教育，而实际上则要在现成的本科课程中抽出至少一年半载的时间，以安置一些现代学科，包括了西方的思想和宗教。由于引进通识教育的人，另有其不同的理想和目标，于是有意无意之间便把通识教育的本旨和方法改变了。时人不察而附和之、追随之。这一来，应是严谨的精萃的通识教育，转了一百八十度而变为松弛的泛滥的变种通识。以香港为例，大学通识教育的学科不断膨胀，“男人女人与语言”算一科，“德国建筑”也算一科。林林总总，课程表上，学科之多，竟以百计。学子们无论怎样去选择，也难凭这些杂科去实现通识教育文件中所宣传的理想和目标。

在这种体制之下，本科学生竟须将高达百分之十五的宝贵学习时间，花费在这些漫无标准的闲散杂学。对学生言，是时间的浪费，对学术言，是无端的负累。移植后变了质的通识教育，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因循苟且，已成为牢不可破的传统。我们所担心的是，近年国内的大学推行现代化，要与国际接轨，这当然是对的，可是，某一些大学竟不幸与变种通识连接起来，纷纷设立类似的港台的通识课程，发展下去势将蹈前车之覆辙，有识之士莫不引以为忧。

幸而在大学教育变化转型的关键时刻，李曼丽博士和

林小英硕士两位青年学者，在汪永铨教授和学飞教授悉心辅导之下，毅然负起研究通识教育的重任。在研究过程中，她们兼顾了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为这个复杂而急切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了分析、求证和检讨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这个重要的报告，及时出版发布，供海内外学界同人参考，这是值得我们深为庆幸的。

癸未暮春，○三年五月四日



后记

本课题为香港中文大学与北京大学合作研究课题，由香港中文大学杜祖贻教授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汪永铨教授共同指导，并拟定研究计划和研究思路。课题成员主要是清华大学李曼丽副教授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林小英。在课题进行过程中，还得到了北京大学陈学飞教授的指导和支持，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陈兵同志也为文献资料的搜集做了大量工作。

课题进行和完成后，杜祖贻教授对书稿提出了修改意见，作者赴香港调研时曾多次当面请益，杜教授从调研计划、联系访谈人员以及生活安排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关心，尤其是杜教授对本课题在资金方面给予了大力资助，使得本课题最终以本书的形式出版，在此深表感谢。

本书诸多不足之处，诚请前辈、同行和读者指正。

作者

2003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大学通识教育：本意的厘清与目标的展望	(5)
一、本意的厘清	(5)
(一) 通识教育概念	(6)
(二) “理想类型”方法和对通识教育内涵 的理解	(9)
(三) 通识教育的含义小结	(17)
二、作为教育改革策略的通识教育目标	(19)
(一) 研究通识教育目标的原因	(19)
(二) 通识教育之目标	(20)
第三章 北京大学现行通识教育目标与课程问题	(25)
一、北京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反省和分析	(26)
(一) 北京大学通识教育的目标	(26)
(二) 北京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现状	(29)
(三) 通识课程修习制度和教学形式	(34)
二、北京大学通识教育问卷调查结果	(35)
(一) 调查方法	(35)
(二) 调查结果	(37)
(三) 现有课程对学生的培养效果	(46)

(四) 划分专业的时间和方法	(49)
三、问题与讨论	(51)
(一) 北京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对通识教育的含义及目标理解不清	(51)
(二) 通识教育课程在设计上体现出较大的随意性	(52)
(三) 通识教育课程的内容过于偏向应用型和专业化	(53)
(四) 由于在修习方式上的太大的自由度，通识教育的效果很难保证	(54)
四、建议	(55)
(一) 北大应在对通识教育的本质和内涵进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现在北大通识教育中出现的问题	(55)
(二) 通识教育的效果受到多方因素影响，适切通识教育的全校必修课与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设置尚需进一步研究	(56)
(三) 不合理的通识教育课程的分量增加太多可能会给学生增加负担，可能也会对专业素质的提高和培养造成一定影响	(57)
第四章 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考察报告	(59)
一、香港中文大学部分人士对通识教育目标、课程、面临的问题的看法	(60)

二、问题及讨论	(73)
(一) 中大师生对通识教育的理解呈现多元化 态势	(73)
(二) 中文大学对通识教育目标的理解比较深入， 但是仍然没有抓住根本	(74)
(三) 关于中大的通识教育课程	(77)
第五章 关于合理的通识教育课程设计模式的讨论	
.....	(86)
一、两种可供选择的课程设计框架	(86)
(一) 分布必修制评析	(86)
(二) “核心课程”评析	(91)
(三) 简短结论	(95)
二、参考性通识教育课程计划	(96)
(一) 通识教育课程应该包括的内容	(96)
(二) 一个可供参酌的通识教育学程计划	(102)
第六章 结 论	(104)
附录一 历史上关于通识教育内涵表述辑要	(106)
附录二 北京四所高校的通识教育	(117)
一、北京四所高校的通识教育目标	(117)
二、北京四所高校素质教育选修课的要求	(119)
三、北京四所高校全校公共必修课一览表：	(120)
四、北京四所高校素质教育选修课程名称：	(121)

五、北京大学关于设置本科生素质教育通选课的 通知	(128)
附录三 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概况	(134)
一、总况	(134)
二、早期(1963至1986):书院为本通识教育	(135)
三、中期(1986至1991):书院通识与大学 “七范围”通识课程	(136)
四、近期(1991至今):书院通识与大学“三 范围”通识课程	(137)
五、多元化之中大通识教育	(138)
六、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课程选课须知	(139)
附录四 国外部分高校的通识教育	(142)
一、杜克大学的通识教育“分布必修”规定	(142)
二、南加州大学文、理学士通识教育分布必修 计划	(144)
三、美利坚大学分布必修计划	(145)
四、Bowdoin College 分布必修计划	(146)
五、哈佛核心课程目录简介	(148)
六、得克萨斯州立大学核心课程	(152)
七、圣本尼狄克特学院核心课程简介	(154)
后记	(157)

第一章 导论

本课题研究的主题是大学通识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具体讲，就是以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为例来检讨内地与香港的高校在推行通识教育过程中，是否存在所开设课程与通识教育目标不相配合的问题。明末儒学家黄宗羲（梨洲，1610—1695）在《明儒学案·发凡》中曾说：“凡学有宗旨，……学者不能得其人之宗旨，亦犹张骞初入大夏，不能得月氏之要领也。”为了使读者对本课题研究的内容有所了解，我们想在开篇之际，先就本课题研究的背景与目的略作阐述。

内地的高等学校在 1950 年后学习前苏联进行教学改革，全面实行“专业教育”。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部分高校教师、研究人员和管理工作者对此前 30 年来过分强调专业教育的弊端和教训进行了总结，比较普遍地提出了与加强通识教育相通的有关主张，各高等学校也分别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进入 90 年代以来，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呼声把上述讨论和实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以致它

目前已经成为政府与高校达成高度共识的、关于教学改革的主导思想。文化素质教育在基本理念上与西方的“general education”是一致的。过去的近 10 年中，在教育部的大力推动下，围绕该主题的研讨会、论著以及教师培训活动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如此一来，“文化素质教育”目前已经成为我国高等学校课程与教学改革中最重要、最热点的内容之一。香港地区也在稍早些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关注通识教育问题，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与实践。

内地和香港的高等教育制度，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许多方面恰成对照，共性来自它们共同的文化渊源，并且两地都曾倾心地学习过美国，并按其学术制度和学术模式建立起本地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之后又有许多独立的思索，结合各自具体情况，塑造了今日之高等教育。个性则源于两地所处的地理环境的不同以及由此造成所接触的外部环境和对历史的继承、精神风貌和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处于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通识教育也是如此，呈现出种种共性和个性。

回顾过去二十多年来内地与香港的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应该说在个别大学或某些课程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整体而言，有待改善之处仍有很多，具体到通识教育的实践和研究方面，在以往的推行中，呈现出以下三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第一种倾向是对西方模式的移植和模仿，而甚少继承中国高等教育传统中可资借鉴的精华，对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创建思考甚少。现代大学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源自西方，通识教育的实施也起源于美国，其成为内地和香

港高等教育的重要方面是后来的事，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回顾中国教育的传统，也不是没有可供当今参考继承的历史智慧，如果一味模仿而不思在自己已有基础上进行转化和创新，则不但不能解决目前现有的教育问题，恐怕反而会衍生出更多的新问题。

第二种倾向是部分学校对通识教育的目标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通识教育课程仍然没有成熟的看法以及较好的设计。多数学校虽然提出了通识教育目的，但是学校所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采用的教学方法以及管理制度等与其所想达到的目的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第三种倾向是表面性的量化研究多于本质性的研究。内地大学所开展的关于通识教育的不少研究，采用问卷量化方式，检讨授课情况、学生反应等技术性问题，这种工作虽然可以提供数量化的信息，对现有通识教育课程之改善有所助益，但是无助于人们对通识教育内涵实质的理解与提升，也无助于与本质内涵相匹配的课程的建设。如果想弥补这种不足，惟有就通识课程内涵本身进行研讨，方可有效解决问题。

内地和香港关于大学通识教育研究和实践的实际情况，所呈现的这三种倾向，说明现阶段多数大学推动通识教育的根本问题在于：缺乏对通识教育理论的深入研究和理解。由于欠缺较具深度的理论基础，因此，各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设计不免流于任意而缺乏体系，开设课程数量虽多而流于“自助餐”式之流水席或“杂货摊”，使学生无所适从，入“宝山”而空返；也由于欠缺理论基础，所以课程设计与教学不免模仿西方模式，移植国外大学之经验，而

较少创新具有本国文化特色之科目或学程。

为了针对内地和香港推动大学通识教育二十余年来所呈现的理论的贫困以及实践的困境加以分析，并提出兼具传统与现代意义的通识教育的基础理论及具体课程计划，本课题研究将从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入手，兼顾对前后两个问题的思考，其主要目的在于：（1）拓展大学通识教育理论的深度与广度，努力从通识教育的本意与内涵中汲取大学通识教育的新灵感；（2）针对内地和香港大学通识教育实践上的基本问题，思考应对的策略，并探讨关于通识教育课程设计的基本原则及学程设计。

本书就是紧扣以上两项宗旨撰写而成的。为了揭示目前多数大学在通识教育实施方面所犯的盲目移植以及对通识教育之目的与方法把握不准确的问题，我们在第二章首先探讨通识教育的本意及其目标究竟是什么，提出通识教育并不是时下流行的理解——“通通都识”，其目标首先是为了“塑造一个具有人性的、真正的人”，也就是说通识教育首先关注的是一个“人”的培养，其次才是把学生作为一个职业的人来培养。第三章探讨北京大学在通识教育的实践中所存在的方法与目的是否配合的问题，接着在第四章讨论香港中文大学是否存在通识教育方法与目的不相匹配之现象；第五章讨论有无更好的、可以达到通识教育目的学程设计；第六章则扩大视野，展望前景，提出一些结论性的看法。